

哲学视域中文化扶贫的内在逻辑： 概念与现实理路

盛新娣

〔摘要〕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了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而“增强脱贫群众内生动力”的紧迫任务。对此,深入研究文化扶贫问题十分必要。“文化”界定直接影响对“文化扶贫”概念的理解。广义的“文化”是人化,根本上是人关于社会发展和人类实践的映现(映射和呈现),内含有关社会及其实践普遍性本质规律映现与个人特殊性具体实践场景映现之间的转换和辩证统一。文化扶贫是对脱贫群众关于当今中国社会本质规律正确映现与脱贫群众关于自身具体实践场景正确映现缺失的帮助,是对脱贫群众完成由前者向后者转换能力缺乏的帮扶。文化扶贫现实理路包括铸牢现实前提、析清现实路径、培育脱贫群众适应现实能力、凝聚形成现实合力。

〔关键词〕 文化;文化扶贫;概念内涵;现实理路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增强脱贫地区和脱贫群众内生发展动力。”^①其中提出了“增强脱贫群众内生动力”这一重大而紧迫的任务。脱贫群众内生动力不足的“实质就是精神方面的贫困”^②,而精神方面的贫困也就是文化贫困^③。针对文化贫困,须着力开展文化扶贫。如果说,脱贫攻坚阶段因应于脱贫群众物质上“两不愁三保障”标准而使得文化扶贫被包裹于由诸多物质和精神因素构成的总体性扶贫任务之中,那么,因应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激发脱贫群众内生脱贫动力”的要求,文化扶贫就显现出独特的重要意义。一般而言,文化扶贫是从文化维度理解贫困,即“文化所涉贫困”,并展开帮扶救助。如何界定“文化”,直接影响对“文化扶贫”概念的理解。人们通常从狭义和广义两种视角界定“文化”概念。狭义的“文化”,主要指意识、思维、价值观等精神性文化,并体现于历史文献、艺术作品、文娱活动等载体形式。可见,在狭义的“文化”意义上,文化扶贫主要指与精神性因素相关的文化扶助。固然,基于狭义“文化”视角的“文化扶贫”概念凸显了文化扶贫的核心内涵,但却不足以涵盖文化扶贫机制、氛围、主体培育等丰富内容,难以达成相关问题的全面理解。鉴于此,笔者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中基于广义“文化”视角阐发“文化扶贫”概念、

盛新娣,哲学博士,新疆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乌鲁木齐 830012)。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南疆四地州巩固脱贫成果与提高公共文化服务效能研究”(21XMZ055)的阶段性成果。

①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31页。

②黄承伟:《激发内生脱贫动力的理论与实践》,《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

③黄承伟:《激发内生脱贫动力的理论与实践》;柳礼泉、杨葵:《精神贫困:贫困群众内生动力的缺失与重塑》,《湖湘论坛》2019年第1期。

阐明文化扶贫现实理路,以便对该问题深入探讨有所裨益。

一、文化根本上是关于社会演变发展整体状况和人类社会生活实践全部过程的映射与呈现

广义的文化就是人化,它是对“历史发展过程中人类的物质和精神力量所达到的程度和方式”^①的映射与呈现(以下统称“映现”)。陈先达先生认为:“对文化的本质……在国内有一种非常流行的、占主导地位的说法:文化就是人化。从人的角度考察文化,把人与文化结合起来,原则上是正确的。”^②人始终是处于一定社会历史中的人,人总是在实践中生存并确证自己的存在,因此,要全面理解“人化”,就“应充分考虑到人的社会性和实践性”^③,而文化只是“处于一定社会形态中的人”^④能动创造的实践产物。强调这点可给予文化社会性、实践性内涵以应有的重视,同时,防止“人化”涵义的抽象性解释而导致对“文化”概念理解的偏差。

人类物质和精神因素综合构成社会发展整体并显示出的演变发展程度,映射于由信仰—信念、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意志情态等构成的深层次精神世界之中。后者借助人的言行、文化符号等载体形式外化于感性世界、赋之于外物。这种映射及其载体形式是社会发展整体状况的表征,诸如由特定文化特别提倡的作为某一群体成员所共享的核心价值、“在一群人中代表意义的声音或手势”^⑤等。文化所映现的社会演变与发展程度并非绝对静止的既成物,而是人类实践创造的过程,因此,文化对于社会及其实践过程的映现具有整全性,具体包含两重视界:其一,关于人类社会整体状况的整全性映现;其二,关于人类社会实践创造过程的全域性映现。

(一) 文化根本上是对社会发展整体状况的映射与呈现

从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维度来讲,人类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总和构成了社会整体的发展状况。广义的“文化”映现了社会整体状况,表征着社会发展所达到的程度。也就是说,文化根本上是用各种各类具体文化形式^⑥对人类社会整体及发展程度的映现或表征。文化的整体性源于社会的整体性,整体性的社会是文化映现的“原型”和形成的基础。唯有借助于文化,社会方能被理解为整体性的存在,或以整体性面目映现于人类的精神世界并借助诸多文化具体形式显现于社会中。在这个意义上,文化就是社会,“社会即涵有文化的意义”^⑦,“文化和社会是互相诠释的”^⑧,“它们融为一体且只能从对方的角度才能描述”^⑨。需要强调的是,文化并非映现社会的某一部分或层面,而是映现社会整体,这就是说,我们不应“简单地把文化与社会生活中某些个别要素相对比,而是要……把文化看成是一个整体”^⑩。作为整体的文化,映现作为整体的社会,而“把社会理解为一个整体是可

①肖前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503页。

②陈先达:《文化自信中的传统与当代》,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4页。

③陈先达:《文化自信中的传统与当代》,第7页。

④陈先达:《文化自信中的传统与当代》,第8页。

⑤[美]威廉·A.哈维兰:《文化人类学》(第10版),翟铁鹏、张钰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第100页下注②。
⑥从表现方式来讲,包括文学艺术、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哲学、科学等形式;从信仰性质来讲,包括有神论(典型的如宗教)的信仰和无神论的信仰;从发生层次来讲,包括社会心理、情绪等低层形式和思想、理论等高层形式。当然,从其他角度划分,还有另外诸多形式。参见盛新娣:《当代西方关于文化发展研究:概念与内涵》,《社会科学》2015年第5期。

⑦丁立群:《“文化实践”:在实践哲学的谱系内——早期文化研究思潮的“文化实践”理论》,《哲学研究》2022年第1期。

⑧丁立群:《“文化实践”:在实践哲学的谱系内——早期文化研究思潮的“文化实践”理论》。

⑨[英]齐格蒙特·鲍曼:《作为实践的文化》,郑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14页。

⑩[苏]瓦维林、[苏]弗法诺夫:《历史唯物主义与文化范畴》,雷永生、邱守娟译,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95页。

以做到的”^①。同样,映现整体社会的“文化”概念也可以成立。

社会与文化二者之间,社会是文化映现产生的基础,文化是以社会为映现对象并呈现社会的表征;社会是具有客观实在性的内容,文化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形式;社会是唯一性的实体,文化映现则具有多样性的视角和取向。根据唯物辩证法的原理,内容与形式辩证统一,作为映现内容的社会决定作为映现形式的文化;文化反作用于社会,文化映现不同,直接影响其所映现的社会内容。例如,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是产生映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基础和实质内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映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形式,文化映现既决定于又反作用于并直接影响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发展整体状况。这意味着,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不同文化映现存在着差异性。

(二) 文化是对人类社会生活实践全部过程的映射与呈现

社会发展并非既成的现状,而是人类社会实践创造的结果,“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②。那么,对于映现整体社会的文化进一步考察,必然会涉及社会实践全过程。实践活动是人“最有代表性的特征”^③,作为社会整体映现的文化,必定在人类社会生活实践中产生,所以,“从根本上讲,文化是关于社会实践的映现”^④,且是人借助一定社会实践中介、依凭一定社会实践方式而创造出来的成果。文化“体现出社会主体——人在其活动以及这种活动所创造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中实现本质力量的程度和方式”^⑤,它不仅映现了社会整体,而且映现了作为社会生活本质的实践全过程。就是说,文化映现了人类社会实践的过程、方式及其结果,映现了人在社会实践过程中深深打下的人自身的意志烙印、人在物质和精神产品中所镌刻的自身特有印记。而人正是通过社会实践全过程,将自己的意识赋予外部世界。

这种映现进一步传播于一定群体使该群体成员能够适应其生存环境、感知环境、作出反应并对现有环境优化调适,其结果是形成适应于该环境的特性,并构建该社会成员通常生存于其中的一系列特殊环境条件。“他们怎样感知环境,就怎样对后者做出反应,而不同的人群可能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感知同样的环境”^⑥。一定社会成员感知及行事方式“一方面根据自己的生物学本性,另一方面根据他们的信念、态度以及他们对其行为后果”^⑦的预计。文化的映现与传播使社会成员理解并适应其生计模式,使原有文化得以“调适”^⑧,这种调适及适应包含观念、活动、制度机制、行为规范、技术和工具、手段等各环节中的各个要素^⑨。例如,文化映现浸渗于社会成员的工作,影响成员的生活态度和观点及生存行为,这种态度及行为与成员社会活动和其个人之间相联系的方式,还影响这种映现与成员生存环境之间的互动、成员所掌握的社会生产技术和知识、“把这种技术应用于地方环境的劳动方式”^⑩等,从而,在该社会成员的谋生方式中发挥作用。再如,文化映现支配资源的习惯和规则并决定经济运行的方式,“在每一个社会中,习惯和规则支配着人们所做工作的种类,谁做工作,谁控制资源和工具,以及工作如何完成。原料、劳动和技术是社会群体可用来生产所期望物品和服务的生

①[苏]瓦维林、[苏]弗法诺夫:《历史唯物主义与文化范畴》,第95页。

②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35页。

③[苏]瓦维林、[苏]弗法诺夫:《历史唯物主义与文化范畴》,第97页。

④盛新娣:《当代西方关于文化发展研究:概念与内涵》。

⑤[苏]瓦维林、[苏]弗法诺夫:《历史唯物主义与文化范畴》,第14页。

⑥[美]威廉·A.哈维兰:《文化人类学》(第10版),第52页。

⑦[美]威廉·A.哈维兰:《文化人类学》(第10版),第52页。

⑧[美]威廉·A.哈维兰:《文化人类学》(第10版),第162页。

⑨[美]威廉·A.哈维兰:《文化人类学》(第10版),第162—163页。

⑩[美]威廉·A.哈维兰:《文化人类学》(第10版),第168页。

产资源。与这些资源使用有关的规则扎根于文化,并决定经济运行的方式。”^①文化映现和传播还借助所创造的文化中介具体形式完成内化,进而浸入人心、控制社会。这具有两种路向和效用:对于成员言行的积极鼓励与认可和消极约束与不认可,“社会控制可以内化,即‘植入’个体内部,也可以以约束形式外化……积极约束鼓励认可的行为,而消极约束则阻止不认可的行为。”^②

总之,文化内含着人的独有特征——社会实践,而“社会实践同样内在地蕴涵着文化内涵”^③,使人本身与实践紧密相关联。那么,从一定社会现实中的人类社会实践角度理解、界定文化,就具有内在的合理性。换言之,文化是社会实践过程的映现。

(三) 文化映现内含整体社会及其实践过程之矛盾统一体

人类社会及其实践是矛盾统一体,矛盾问题精髓是一般与个别、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因而,“现实社会始终是一般和特殊的辩证统一”^④。作为人类社会及实践的映现,文化内含着社会及实践的矛盾统一体,其矛盾精髓就是关于社会及其实践普遍性本质规律映现与特殊性具体实践场景映现之间的辩证统一。

文化是对社会普遍性本质规律和特殊性具体实践场景的映现。首先,文化是对社会普遍性本质规律的映现。“文化”概念“所表述的仅是这种社会现象的最一般的属性”^⑤,它再现了一定社会“现实的规律”^⑥,“具有最大的普遍性,也是最高度的抽象。它反映着各种不同的文化现象的统一性,而在抽象中撇开了这些现象的特殊性”^⑦。例如,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及其实践过程的普遍性本质规律的映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其指导下建构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高度的理论性、抽象性。其次,文化是对社会及其实践中特殊性具体场景的映现。文化映现个人在特殊时空当中具体实践的诸多细节,如特定地域、群体特殊的富有特色的社会文化风俗,个人的成长背景、形成的惯习、独特的消费方式等。人正是在这种具体实践场景中创生使普遍、抽象性具体化的概念,这些概念“是从抽象到愈益具体地反映文化这一认识运动的各个阶段,在这里把文化作为某种特殊的社会现象来看待。根据这一切就能愈益具体地描绘历史上曾经产生和存在过或现在还存在着的一个个别的文化现象”^⑧。例如,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中脱贫群众关于其特殊遭际、境遇所产生的具体实践场景的映现。再次,文化是关于社会及其实践普遍性本质规律映现与特殊性具体实践场景映现的矛盾统一体。普遍性本质规律映现与特殊性具体场景映现既有区别和差异又有联系和共同之处,二者是相互对立的关系。这就是说,文化映现着寓含于一定个人特殊性具体实践场景中的社会普遍性本质规律,同时,文化映现着某一社会普遍性本质规律所寄寓的个人特殊性具体实践场景,亦即,关于某一社会普遍性本质规律的映现与特殊性具体实践场景的映现之间是辩证矛盾的统一体。例如,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为人们勤劳致富奠定了广泛而坚实的基础,而这又要求人们必须最大限度地发挥主观能动性、依靠自己努力奋斗和辛勤劳动获得幸福。但一些(个)人却一味儿消极等待或臆想在轻轻松松玩乐中过上富裕幸福的生活,这显然违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就是说,在“怎样得到富裕幸福生活”的问题上,关

①[美]威廉·A.哈维兰:《文化人类学》(第10版),第196—197页。

②[美]威廉·A.哈维兰:《文化人类学》(第10版),第349页。

③丁立群:《“文化实践”:在实践哲学的谱系内——早期文化研究思潮的“文化实践”理论》。

④[苏]瓦维林、[苏]弗法诺夫:《历史唯物主义与文化范畴》,第69页。

⑤[苏]瓦维林、[苏]弗法诺夫:《历史唯物主义与文化范畴》,前言第11页。

⑥[苏]瓦维林、[苏]弗法诺夫:《历史唯物主义与文化范畴》,第26页。

⑦[苏]瓦维林、[苏]弗法诺夫:《历史唯物主义与文化范畴》,第74页。

⑧[苏]瓦维林、[苏]弗法诺夫:《历史唯物主义与文化范畴》,第74页。

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普遍性本质规律的映现与一些(个)人有关自身具体特殊性实践场景映现之间有很大差别,甚至截然对立。但是,二者之间又相互联系、依存和转化。具体而言,人发挥主观能动性依靠自己努力奋斗和辛勤劳动争取幸福的观念及方式往往是与消极等待或臆想通过轻松玩乐得到幸福的观念及方式并存,前者在同后者的斗争中不断调整和优化并凸显其正面价值和能量,在对后者的批评教育中影响后者并使后者逐渐向前者转化。

从动态过程来讲,关于社会普遍性本质规律映现与特殊性具体实践场景映现的辩证统一是相互转换的过程。关于社会普遍性本质规律映现浸入并引导个人关于其特殊性具体实践场景映现,而后者又体现且升华为前者。不仅如此,关于普遍性本质规律映现浸入关于特殊性具体实践场景映现、后者跃迁为前者的相互转换的中介,亦是文化,如概念形式。在这个意义上,人们“应当制定一些与此相适应的概念,以便在自己的统一体中,在指定的反映层次上系统地即理论上完整地反映社会现实”^①。只有创生相应于社会普遍性本质规律映现的具体概念或范畴,方能映现含括人类实践活动主体、对象、方式、结果等在内的系统而完整的全过程。关于社会普遍性本质规律映现与特殊性具体实践场景映现二者之间是在相互同一中对立、在相互对立中同一,呈现出一种动态的转化过程。例如,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于中国农村具体实际,经历了引导和组织农民从合作化到包产到户又到再合作化的过程,领导农民不断增强抵御天灾人祸、脱贫致富的能力。同时,帮助广大农民群众形成关于“社会主义本质规律”的映现并将这种映现与自身“投入农业生产并提高种植养殖水平以勤劳致富”的具体场景映现相统一,呈现出动态性的实践过程。

二、文化扶贫是对脱贫群众关于社会普遍规律与特殊具体场景正确映现缺失和二者转换能力缺乏的扶助

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文化是某群体(政党、国家、民族等)所共认的有关社会普遍性本质规律映现与特殊性具体实践场景映现的矛盾统一体。然而,针对群体某成员来讲,这并非“先天必然”(康德语)的,而要视其能否将关于普遍性社会本质规律映现转化并融入有关自身特殊性具体实践场景映现之中,并使前者成为后者的宏阔性视野与概念框架。关于社会普遍性本质规律映现转向特殊性具体实践场景映现的过程,是人形成精神文化、建立体现精神文化的制度文化、由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所支配的物质文化创造及文化环境塑造的过程。因此,文化既包括有关普遍性社会本质规律映现与特殊性具体实践场景映现,又包含促使前者转向后者的能动意识所创造的文化中介形式。由于脱贫群众关于社会普遍性本质规律映现与其关于自身特殊性具体实践场景映现都存在偏差,将前者转向后者的意识能动性不足、文化创造能力缺乏、文化中介形式缺失,因而,他们难以发挥意识能动性去完成前者向后者的转换,更遑论展开文化中介形式的创造实践。当前,文化扶贫就是对脱贫群众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普遍性本质规律与其自身特殊性具体实践场景正确映现缺失的扶助,是对脱贫群众由前者转向后者的意识能动性薄弱和文化中介形式创造实践能力的缺乏展开帮扶。

(一) 文化扶贫是对脱贫群众关于社会普遍本质规律正确映现与特殊具体实践场景正确映现缺失的扶助

文化扶贫是对关于社会普遍性本质规律正确映现缺失的扶助。文化是对于零散客观现象共同性加以概括并投射于人的意识思维之中、呈现于诸多器物之中的过程及结果。这使人对于整个世界

^①[苏]瓦维林、[苏]弗法诺夫:《历史唯物主义与文化范畴》,第84页。

形成富于逻辑性的清晰印象、对于自身实践产生明确方向性的行动指南,否则,人对于世界可能是碎片化混乱理解、对于实践可能会盲目而不知所终。正如学者所说:“如果归入文化之中的那些现象没有任何共同性,那么,文化概念就是不需要的,它只能给认识这些现象带来混乱”^①。关于社会普遍性本质规律的正确映现,能够给予人们清晰把握总体社会、理解分析世间万象的科学概念框架,从而,避免因思想逻辑混乱或模糊而导致实践行动不知所措甚或盲目冒进的观念陷阱。这正是文化的一个重要价值所在。也正因如此,任一社会普遍性本质规律,必定“能够被理论地加以体现,成为抽象的——一般的文化概念的内容”^②。但由于一部分人关于社会普遍性本质规律的正确映现缺失或有偏差,就会产生文化所涉贫困。例如,脱贫群众仍然存在与勤劳奋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格格不入的“等、靠、要”等观念。因此,文化扶贫就是帮扶脱贫群众形成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普遍本质规律的正确映现,引导他们学习领悟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启发他们全面准确理解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及由其主导的价值观念体系,明了社会主义社会“共同富裕”的本质,确立“苦干胜于苦熬”的信心决心。同时,创建相应的制度文化,创生表现上述内容、包涵上述意义的文化形式与载体,倡导并营造通过自身辛勤劳动、努力奋斗而创造幸福生活的思维观念和环境氛围。

文化扶贫是对个人关于其特殊性具体实践场景正确映现缺失的扶助。文化是有关普遍性本质规律的映现,其“内容归根结底是由对象的内容决定的”^③。所谓“对象的内容”,就是文化所映现的那一社会普遍性本质规律,后者是特殊性具体实践“经过比较而抽出来的共同点,本身就是有许多组成部分的、分别有不同规定的东西”^④。映现具体社会实践的概念、理论及其相应形式能动地构成并体现关于普遍性本质规律的映现。一方面,关于社会普遍性本质规律的映现必定寓含于且须浸入关于特殊性社会实践场景映现,进而,内化于个人心灵、外化于个人行动,否则,有关社会普遍性本质规律的映现就是空洞、抽象的形式;另一方面,关于特殊性社会现象及实践场景的映现必定包含且受制于有关普遍性社会本质规律的映现,否则,关于具体实践场景的映现就是狭隘、局促的。这就是说,文化“相对于一般规律而言,是在特殊性之中,相对于某些具体历史条件下某些具体国家实现这些规律的具体历史特征而言,又是在一般性之中来反映社会过程”^⑤,故“文化包括社会发展的全部范围,包括人类活动的一切形式”^⑥。例如,当下中国文化映现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省(市)、地(州)、县、乡、村各阶层和各行业人们对富裕幸福生活的愿景、对美好未来的想象、对后代发展的期许等。然而,脱贫群众却缺失关于自身生活境遇、遭际的正确映现,一味耽溺于对其处境抱怨、偏激观念,或茫然无措、不思进取。对此,文化扶贫通过教育灌输、分析开导、典范示例等方法手段,既要使脱贫群众映现出个人所生存的具体境遇而防止抽象空洞性,又要使脱贫群众映现出个人存在的普遍宏阔性而避免狭隘局限性,进而,帮扶脱贫群众基于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规律的正确映现而形成关于自身特殊性具体实践场景的正确映现。

(二) 文化扶贫是对贫困群众有关社会普遍本质规律映现转向特殊具体实践场景映现理解力缺失的扶助

关于社会普遍性本质规律的映现与特殊性具体实践场景的映现之间是相互依存和灵动变化的,

①[苏]瓦维林、[苏]弗法诺夫:《历史唯物主义与文化范畴》,第33页。

②[苏]瓦维林、[苏]弗法诺夫:《历史唯物主义与文化范畴》,第33页。

③[苏]瓦维林、[苏]弗法诺夫:《历史唯物主义与文化范畴》,第76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22页。

⑤[苏]瓦维林、[苏]弗法诺夫:《历史唯物主义与文化范畴》,第71页。

⑥[苏]瓦维林、[苏]弗法诺夫:《历史唯物主义与文化范畴》,第62页。

二者之间在差异和对立中蕴藉着贯通与转换。转换意指人的意识思维对自身的彻底突破而发生一种质态向另一种质态的转变过程。具体到此处,就是关于社会普遍性本质规律的映现彻底发生质变而过渡到关于特殊性具体实践场景的映现。人通过具体生活实践体察社会普遍性本质规律,逐渐产生对特殊性具体实践场景的映现并超越有限经验而形成有关客观社会普遍性本质规律的映现,且外化为概念、范畴及其逻辑地构成的理论形式。有关社会普遍性本质规律映现包含于有关特殊性具体实践场景映现之中,后者内含客观社会的多样性具体细节和有关普遍性社会本质规律映现向特殊性实践场景映现转换的具体情境,并形成映现这一具体细节、场景的抽象性理想图式。当人形成这种理想图式时,就意味着他/她产生了有关普遍性社会本质规律映现向特殊性具体实践场景映现转换的理解力。由此,文化概念“可以构造从属于它的、描述文化的个别方面的、派生的、个别的概念,这些概念促使一般概念具体化、丰富化,但是不能代替它。”^①促使文化一般概念具体化且描述文化个别方面的概念,又在关于社会普遍性本质规律映现向特殊性具体实践场景映现转换中支配并体现于人所创生的文化中介形式。

文化所涉贫困,就是缺失有关社会普遍性本质规律映现向特殊性具体实践场景映现转换的文化中介,或停滞于有关普遍性社会本质规律映现而成为抽象、空洞的理性形式,或局限于有关特殊性具体实践场景映现而成为狭隘、浅表的生活碎片。总之,都未能完成这种转换。例如,脱贫群众由于未能真正理解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本质规律映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懂得其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内在关联,不明白党和国家的政策和措施与增强自己脱贫致富的密切联系,就很难提高其内生动力,致使其无法彻底摆脱文化所涉贫困。文化扶贫就是帮扶脱贫群众顺利展开关于社会普遍性本质规律映现向特殊性具体实践场景映现的转换过程,扶助其形成体察并理解这种转换的能力、实现抽象性理想图式的具象化,进而,帮助脱贫群众完成有关普遍性社会本质规律映现内化、浸入其有关自身特殊性具体实践场景映现之中,帮扶他们生成由前者向后者转换的理解能力,进而,帮助脱贫群众形成脱贫致富内在动力的观念基础,促使他们不断深化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规律的认识,增强脱贫致富自觉性与正确导向力,坚定脱贫致富的信心决心。

如前所述,关于社会普遍性本质规律的映现向特殊性具体实践场景映现的转换,并非绝对静止的既成集合体,而是运动、变化、发展的矛盾统一体,是人发挥意识能动性促使关于社会普遍性本质规律映现向特殊性具体实践场景映现的转换过程,而这种转换惟在人的实践创造之中得以实现或完成。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扶贫就是帮助脱贫群众生成这种转换得以实现的创造能力。

(三) 文化扶贫是对脱贫群众关于社会普遍本质规律映现转向特殊具体实践场景映现之创造力缺乏的扶助

贫困者所处的文化环境、所接受的文化习俗、所拥有的文化观念等成为阻碍他们完成关于社会普遍性本质规律映现转向特殊性具体实践场景映现的文化观念因素,从而形成“与主流文化不相容而处于边缘状态的特有文化”或“相悖于主流社会的亚文化生活方式”^②,这使得贫困者“在精神状态、价值取向、思维观念、道德水平、心理素质等方面落后于社会主要物质生产方式”^③。在当下中国,贫困所涉文化使得脱贫群众难以适应社会主义社会生产方式发展所要求的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环境,其深层原因是他们未形成关于当下中国社会普遍性本质规律的正确映现。文化扶贫就是要帮扶

^①[苏]瓦维林、[苏]弗法诺夫:《历史唯物主义与文化范畴》,第39页。

^②郇建立:《农村的贫困、贫困文化与脱贫》,《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3期。

^③柳礼泉、杨葵:《精神贫困:贫困群众内生动力的缺失与重塑》。

并促使脱贫群众的精神文化得以调适而相符于有关当下中国社会普遍性本质规律的正确映现,并将后者作为形成其关于自身特殊性具体实践场景正确映现的观念基础与价值引领以展开文化创造实践,进而,创生完成这种转换的内在理想图式外化所须借助的描述和表达之文化中介形式。

关于社会普遍性本质规律的映现转向特殊性具体实践场景映现的内在机理,即,人的意识思维抽象概括有关现实社会的本质规律—运用此抽象模式解析特殊性具体实践场景—生成映现当下现实社会及其实践过程的理想图式—创造理想图式外化所须借助的文化中介形式。这种理想图式既规约前者转向后者的文化中介形式,又“包括这些形式所描述的全部具体内容”^①;既包括主体创造这些形式所寄寓的过去与当下社会的演变脉络,又涵盖这种创造所生发出的未来发展原则和大致走向。通过理想图式,文化既映射、呈现出多样的特殊性实践境况,又外化为具体实践场景映现,最终在实践的“个性、具体性和不可重复性中反映出一般和特殊、必然和偶然辩证统一组成的过程”^②。人一旦具有运用这种文化的能力,不仅可以透过特殊经验层次“在其具体表现中考察规律”^③,而且能洞察到深层次的理论,在关于普遍性社会本质规律的正确映现框架中明了关于普遍性社会本质规律映现向特殊性具体实践场景映现转换的合理走向,为创造描述和表达理想图式的载体形式定立方位,并在该创造过程中发挥调节及优化的功能。

显然,脱贫群众缺乏完成这种转换的实践创造能力,也难以发挥转换所借助的文化中介作用。文化扶贫就是帮扶脱贫群众在有关当今中国社会普遍性本质规律映现支配下联结其有关自身特殊性具体实践场景映现,创造出由前者向后者转换所须借助的文化中介形式,进而,帮助他们掌握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社会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一致、适合于脱贫致富具体场景理解与描述表达的文化形式,诸如以脱贫致富为中心的概念理论、观念思维、情态心志、文艺作品、文化活动等。通过上述文化中介形式,将有关当今中国社会普遍性本质规律的映现浸润、内化于脱贫群众的心灵,濡化其观念、思维、情态,重塑其生活方式,从而,使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文化价值观浸润脱贫群众的内在精神世界、融入其生活方式,并创造、化生适应性文化载体表达形式。这种文化创造能力的形成表明文化扶贫的成功,即,使脱贫群众“借助于对具体性的描绘”^④完成关于当今中国社会普遍性本质规律正确映现向其特殊性具体实践场景映现的转换,改变脱贫群众与主流文化格格不入、不适应于当代生产方式发展要求的文化现状,从而,摆脱文化所涉贫困。

三、帮扶脱贫群众完成由关于社会普遍性本质规律映现向特殊性具体实践场景映现转换的现实理路

文化扶贫必定在某种社会历史条件下方能现实地展开,这就关涉纷繁多样的生动场景和细致特征。因而,在一般性文化定义基础上,还应深入文化所赖以产生和形成的特定社会现实中去了解其具体多样细节并透过现象把握本质规律,方能全面深刻理解“文化扶贫”的概念含义、阐明脱贫群众文化创造展开的现实理路。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文化创造的社会历史性条件当溯源至社会关系——最根本是社会的生产关系。这就是说,脱贫群众的文化创造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社会生产关系为社会历史性前提基础,后者使前者成为可能;脱贫群众的文化创造根本上又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社会生产关系性质的重要体现,前者是后者基础作用发挥的客观必然结

①[苏]瓦维林、[苏]弗法诺夫:《历史唯物主义与文化范畴》,第72页。

②[苏]瓦维林、[苏]弗法诺夫:《历史唯物主义与文化范畴》,第72页。

③[苏]瓦维林、[苏]弗法诺夫:《历史唯物主义与文化范畴》,第72页。

④[苏]瓦维林、[苏]弗法诺夫:《历史唯物主义与文化范畴》,第73页。

果。易言之,只有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这一根本条件下,帮扶脱贫群众创生由关于当今中国社会普遍性本质规律映现转向其关于自身特殊性具体实践场景映现的文化创造实践才能现实地展开。因此,只有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条件下方能从根本上全面深刻理解且建构文化扶贫的现实理路。

(一) 置“人民中心”理念于引领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发展的思想之基以铸牢文化扶贫现实前提

当今中国文化扶贫不仅帮扶脱贫群众消除导致其贫困的精神文化因素,而且在实践中建立并巩固消除上述致贫精神性因素的现实基础——以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立起更加适应当代生产力状况的生产关系,广大人民群众成为社会的主人。中国共产党以“以人民为中心”思想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巩固发展的价值引领和观念基础,“不断实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①包括脱贫群众在内的广大人民既受益于又推动着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巩固。但由于脱贫群众意识观念的偏差、谋生技能的缺乏等而无法更充分地享用生产力发展成果,也难以更充分地发挥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的推动作用,因此,文化扶贫尤其重要。只有适应于当代社会生产力状况和科学技术发展要求,建立和巩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关键是以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基本经济制度,帮扶脱贫群众具备文化创造能力方可现实地展开。

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条件下,文化扶贫能够帮扶脱贫群众摒弃腐朽落后的思想观念,提高其文化知识水平,持续开展生产工艺及科技的改进和创新,因而,极大激发出潜藏于脱贫群众身上的积极能动性,并汇聚成推动当下中国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有生力量。由此,文化扶贫生动展现出“发展依靠人民”^②的思想。同时,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条件下,文化扶贫作为以“人民中心”为价值引领的一种具体实践,通过帮扶脱贫群众完成由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普遍性本质规律正确映现转向其关于自身特殊性具体实践场景正确映现,就能够帮助他们适应于当下中国社会文化环境,具备跟进时代节奏的动力与能力,成功应对当下中国社会变动性与多样性的环境及其面临的挑战或难题,与其他人一起迈上共同富裕的梯阶。通过文化扶贫,使脱贫群众在物质富裕的同时,还获得了精神文化的丰富、充实与满足。这是“发展为了人民”^③思想的生动展现。

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条件下,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巩固发展既承载着“以人民为中心”理念的思想内涵,又提供了后者真实存在的前提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在论述作为农村社会主义公有制主要形式的集体经济实力的作用时强调,“集体经济是农民共同致富的根基,是农民走共同富裕道路的物质保障”^④,“只有不断发展壮大乡村两级集体经济,才能有效地兴办集体公益事业,发展教育事业,活跃农村文化生活,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提供物质基础”^⑤。以上论述同样适用于文化

①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27页。

②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27页。

③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27页。

④习近平:《摆脱贫困》,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93页。

⑤习近平:《摆脱贫困》,第195页。

扶贫。就是说,“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是脱贫致富的主导力量”^①,为脱贫群众享用精神文化产品并进行文化创造提供了充分可能性。因此,文化扶贫应当首先帮助脱贫群众深刻理解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思想,并将此观念贯穿于文化创造过程,“有意识地增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力量,以不断培养人们的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精神”^②,让脱贫群众“亲身体会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优越性,感受到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休戚与共的关系,从而增强建设社会主义的责任感和信心”^③。

(二) 融“志智双扶”于有关社会普遍规律映现转向特殊具体场景映现过程以析清文化扶贫现实路径

如前述,实践是人“最有代表性的特征”^④,帮扶脱贫群众展开文化创造就是文化扶贫实践最有代表性的特征。在当今中国,脱贫群众的文化创造,根本上就是他们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普遍性本质规律正确映现转向特殊性具体实践场景正确映现所需借助的文化中介形式的创造实践。那么,这种创造实践得以展开的客观社会环境——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就构成他们展开文化创造的现实场域。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为分析脱贫群众文化创造实践提供了一种基本的概念框架。因而,脱贫群众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普遍性本质规律映现转向其关于自身特殊性具体实践场景映现的文化创造,前提当是全面、准确映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普遍性本质规律,以有效创造完成关于普遍本质规律映现转向特殊性具体实践场景映现的文化中介形式。前者是否正确,直接影响后者的效果。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基于历史演进的时代性、阶段性,特别是建基于生产关系之上的社会关系性质,使得文化创造主体的实践提升空间内蕴着前所未有的可能性,也为包括脱贫群众在内的全体劳动者生发出更强烈的文化创造自觉能动性奠定了现实基础。但实际上,脱贫群众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普遍性本质规律却并未作出全面、准确的映现,更未能由这种映现引领、生发出应有的文化创造自觉性。例如,思想文化上的“愚、懒、妄、颓”且与穷形成顽固恶性循环问题^⑤;有的不乏“脱贫致富的决心,却伴有缺乏文化知识、科学技术的苦衷”^⑥。以上种种,对脱贫群众将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普遍性本质规律的正确映现转向特殊性具体实践场景正确映现的文化创造有很大阻碍作用。因此,文化扶贫的要务,便是帮扶脱贫群众基于有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普遍性本质规律正确映现的理解分析框架,以观照自身特殊性具体实践场景并形成有关这一场景的正确映现,创生完成这种转换所需借助的文化中介形式。无疑,必须帮扶脱贫群众“立志”与“增智”。换言之,“志智双扶”是文化扶贫的主要内容,也是帮扶脱贫群众完成这种转换的有效途径。

文化扶贫首先要帮扶脱贫群众树立文化创造之“志”(包括思想意识、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心态情志等)。脱贫群众在思想深处不理解且未形成适应于当下中国社会“积极努力奋斗脱贫”的观念意识,存在着“意识贫困”“思路贫困”^⑦。对此,应当通过思想教育、文化熏陶等着力激发脱贫群众发展生产、脱贫致富的主动性,帮助他们冲破“等、靠、要、懒”的观念和条件的束缚、树立并强化自强自立的志向,引导他们依靠勤劳双手和顽强意志实现脱贫致富。与此相关,还应培育脱贫群众形成积极

①习近平:《摆脱贫困》,第154页。

②习近平:《摆脱贫困》,第154页。

③习近平:《摆脱贫困》,第154页。

④[苏]瓦维林、[苏]弗法诺夫:《历史唯物主义与文化范畴》,第97页。

⑤柳礼泉、杨葵:《精神贫困:贫困群众内生动力的缺失与重塑》。

⑥习近平:《摆脱贫困》,第173页。

⑦习近平:《摆脱贫困》,第216页。

努力摆脱贫困的言谈、行为习惯和生存方式,使其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得到某种重塑,在意志力和智力方面的潜能都得到最大的提升和全面自由地发挥。同时,针对脱贫群众知识基础薄弱、谋生技能缺乏的状况,应当因地制宜地大力开展知识教育和技能培训,不断提高脱贫群众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和生产劳动水平,并具有一技之长,从而,帮扶他们具备文化创造实践的能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科学技术是脱贫致富的关键。我们应当有意识地在推进科学技术进步的进程中,不断提高人们的科学文化素质。”^①

(三) 将唯物辩证法贯穿于科学形塑文化脱贫主体综合统一过程以培育脱贫群众主动适应现实能力

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包括文化扶贫在内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取得胜利的核心力量!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担当起这种重任,根本原因在于,她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政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坚强而有力的领导集体,“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②。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与方法论指导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将唯物辩证法作为认识和解决重大实践问题的根本方法论,取得一个又一个伟大成就,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所指出的,“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③。同样,文化扶贫实践必须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将唯物辩证法作为这一实践的根本方法论指导,才能取得最终的胜利。

根据唯物辩证法,文化必定是客观社会的产物,文化扶贫实践必定是客观现实的过程。从客观现实出发看待文化扶贫实践,理所当然应置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之中。在这种背景下,文化扶贫实践包含两个相向而行的维度:其一,党领导并组织对于脱贫群众的救助,促使后者形成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普遍性本质规律映现并完成向特殊性具体实践场景映现的转换;其二,脱贫群众在党的领导下,通过党员干部的帮扶,自觉主动完成由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普遍性本质规律映现向特殊性具体实践场景映现的转换。在文化扶贫过程中,作为这一实践的对象,脱贫群众逐渐树立主体意识、增强主体能力,其观念“变‘要我脱贫’为‘我要脱贫’”^④。脱贫群众主动脱贫致富的决心和信心坚定而持久,自我发展能力持续得到提高,生存发展方式真正转变,具有更强大的脱贫致富内生动力,进而,由消极被动的自发客体转变为积极能动的自觉主体。亦即,按照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要求被成功地形塑为文化脱贫主体。

从客观现实出发,文化脱贫主体的形塑具有复杂性、多层次性,是一个综合性、系统性“工程”。首先,在核心的精神文化层面上,要帮助脱贫群众深入理解当今中国现实社会普遍性本质规律并形成对该社会更全面准确的映现,为脱贫群众完成关于这种普遍性本质规律映现转向特殊性具体实践场景映现提供思想观念的基础;其次,在关键的制度及规范层面上,通过建立相应的约束-激励机制,帮助脱贫群众依循与精神文化层面相一致的思维观念,完成由关于当下中国社会普遍性本质规律的正确映现转向其关于自身特殊性具体实践场景的正确映现;再次,在丰富的物质(器物)文化层面上,围绕精神文化层面的形塑,依凭制度及规范层面的形塑,帮扶脱贫群众创生承载社会主义意识

^①习近平:《摆脱贫困》,第155页。

^②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16页。

^③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17页。

^④《习近平扶贫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141页。

形态和核心价值观内容的文化载体形式,以构建对脱贫群众具有良性熏染与陶冶的文化环境。通过这一形塑“工程”,帮扶脱贫群众形成有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及其实践过程的正确映现,使他们具备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发展所要求的思维观念和生活技能,从而,适应于当下中国的社会现实。

(四) 使文化扶贫主体形塑嵌入文化脱贫主体形塑矛盾解决过程以组织凝聚产生文化扶贫现实合力

文化脱贫主体形塑的成效,与实施这种形塑的文化扶贫主体(党和政府相关工作人员及其他社会力量)自身形塑的成功与否密切相关。为此,文化扶贫主体须完成自我形塑以便与脱贫群众具有同理心和共情力,正所谓“打铁必须自身硬”^①。文化扶贫主体自我形塑并非孤立既成的,而是帮扶脱贫群众成为文化脱贫主体的文化扶贫实践结果。就是说,文化扶贫主体自身形塑惟在帮扶文化脱贫主体成功形塑解决所须解决的矛盾(问题)中才能完成。这就要使文化扶贫主体自身形塑嵌入文化脱贫主体形塑的矛盾解决过程。就现实而言,文化脱贫主体成功形塑须解决如下矛盾:

第一,针对脱贫群众主体意识形塑中外力过多却内力激发不够的矛盾,文化扶贫主体应当深悟并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理念,不仅将脱贫群众当作文化扶贫的对象,而且当作文化脱贫的主体,增强对脱贫群众“既是脱贫攻坚的对象,更是脱贫致富的主体”^②论述的领悟和践行能力,注重启发脱贫群众将有关当下中国社会普遍性本质规律映现转变为其精神世界中的支配性意愿和映现其具体实践场景的隐含性观念,充分调动他们脱贫致富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着力激发其“走出贫困的志向和内生动力”^③,促使其“脱贫致富的内在活力”^④得到极大提升,帮扶脱贫群众由单纯扶助对象变成具有文化创造内生驱动力的自觉主体。

第二,针对脱贫群众所处环境形塑中重物质却轻精神的矛盾,应给予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同等程度的重视,“一方面要让人民过上比较富足的生活,另一方面要提高人民的思想道德水平和科学文化水平,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脱贫致富”^⑤。精神文明建设是消除精神愚昧、增强脱贫致富信心和决心的过程,也是增强文化脱贫主体意识的过程。若要成功形塑文化脱贫主体,文化扶贫主体就应当致力于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经济发展与文化建设的有机统一,致力于“精神文明建设中的‘立’与‘破’”^⑥、文化建设形式与内容的有机统一,使脱贫致富的思想内容通过脱贫群众易于接受的形式表现出来以创造益于文化脱贫主体形塑的文化环境。

第三,针对脱贫群众形塑得以成功实施的文化中介形式创制中存在的文化产品供给与需要不匹配矛盾,文化扶贫主体应当着力提高公共文化服务效能、促进文化产业发展,以加大有益于脱贫致富的优质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供给。同时,通过建立并不断完善制度规范,给予脱贫群众的言行以正向激励,引导其经常性接触映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意识、价值观念的文化作品,接受适应这一社会的思想观念和知识技能,促使脱贫群众形成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营造有益于他们增强“依靠努力奋斗、增长脱贫本领”信心的文化环境及氛围,使文化脱贫主体形塑的“环境浸润”^⑦策略

①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13页。

②《习近平扶贫论述摘编》,第143页。

③《习近平扶贫论述摘编》,第139页。

④《习近平扶贫论述摘编》,第131页。

⑤习近平:《摆脱贫困》,第149页。

⑥习近平:《摆脱贫困》,第152页。

⑦柳礼泉、杨葵:《精神贫困:贫困群众内生动力的缺失与重塑》。

得以顺利实施。

需要强调的是,文化脱贫主体成功形塑的关键是党的坚强有力领导,因而基层党组织和党领导的文化人才队伍建设至关重要。作为文化扶贫实践主体的党员、干部,应当认真学习并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扶贫的重要论述,深入理解和掌握我们党关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共同富裕的方针政策,不断提高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及经营管理知识水平,“以奋发有为的精神”^①唤起脱贫群众开展文化创造的自觉主动性,发挥强大的组织动员功能以凝聚形成文化扶贫的现实合力。

(责任编辑:张 升)

The Inner Logic of Cultural Poverty Allevi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hilosophy: Concept and Realistic Logic

SHENG Xindi

Abstract: The report of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has put forward the urgent task of “helping people who have just shaken off poverty build their own momentum for growth” in order to consolidate and expand the achievement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In this regard, it is necessary to study the issue of cultural poverty alleviation in depth. The definition of “culture” directly influences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cept of “cultural poverty alleviation”. In a broad sense, “culture” is the result of the humanization of the world, which is fundamentally human’s reflection (i. e., “mapping and representation”) of social development and human practice, including the transformation and dialectical unity between the reflection of the universal nature of society and its practice and the reflection of the specific practice scene of individual particularity. Cultural poverty alleviation is to help people who have just shaken off poverty to correctly reflect the essential laws of today’s Chinese society and to correctly reflect the scenes of their own specific practice. It is also a help for these people to complete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former to the latter. The realistic logic of cultural poverty alleviation includes firmly building the realistic precondition, clarifying the realistic path, cultivating people’s ability to adapt to the reality, and forming convergence of realistic forces.

Keywords: culture; cultural poverty alleviation; conceptual contents; realistic logic

About the author: SHENG Xindi, PhD in Philosophy, is Professor at School of Marxism, Xinjia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830012).

^①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2页。